

# 高丽道观福源宫考\*

黄 勇

福源宫是高丽睿宗时期建造的皇家道观。经考证,福源宫创建于政和六年,建成于政和八年,可能是仿照宋朝道观太一宫所建。福源宫是从属于国家祭祀体系的宗教机构,其宗教功能主要是为国家和王室祈福禳灾。福源宫的建造,标志着在高丽正式形成了以宫观为依托的纯正的科仪道教,提升了道教在高丽王朝的地位,扩大了道教的影响,但是道教的地位及影响仍然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

**关键词:** 道教 福源宫 太一宫 斋醮 国家祭祀体系

**作者** 黄勇,1972年生,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高丽王朝(918—1392)是韩国历史上道教非常盛行的时代。虽然高丽初期“于毬庭醮祭天地山川及其他种种醮祀,无非出于道教的意义,而但其行事,杂于佛教的思想,不可谓之纯全道教”。<sup>①</sup>直到睿宗(1105—1122年在位)时期,仿照宋朝道观建造福源宫之后,高丽王朝才有了较为纯正的道教。因此,福源宫在韩国道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一、福源宫的名称及建造时间

古籍对福源宫名称的记录颇不一致。最早记载福源宫的文献,是宋朝人徐兢的《高丽图经》。据《高丽图经》记载,此道观名为福源观;《宋史·高丽传》则称此道观为福源院。然而,多数韩国文献均作福源宫,仅有《海东绎史》、《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宋史笺》等少数韩国文献或作福源观,或作福源院。考其原文,作福源观的均抄自《高丽图经》,作福源院的均抄自《宋史·高丽传》。

《宋史》修纂于至正三年(1343),离高丽睿宗时期已有二百余年,其说不一定可靠。《高丽图经》是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丽回国后所作,虽然其时离福源宫创建时间不远,但是据徐兢自述:“在高丽才及月馀,授馆之后,则守之以兵卫,凡出馆不过五六。”<sup>②</sup>可见他在高丽并没有多少自由游览的机会。另外,徐兢在描述福源宫内宗教设施时说:“尝闻殿内绘三清像,而混元皇帝须发皆绀色,偶合圣朝图绘真圣貌像之意。”<sup>③</sup>据“尝闻”一语可知,徐兢并没有亲自到过福源宫。他称此道观为福源观,或系传闻之误。韩国文献最早提到福源宫的是高丽人林椿作于毅宗十二年(1158)前后的《逸斋记》,此时距建造

\* 201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13B052)“中韩关系史上的道教交流”阶段成果。

① [韩]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77年,第389页。

② (宋)徐兢:《高丽图经·序》,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2页。

③ (宋)徐兢:《高丽图经》卷十七《祠宇》福源观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84页。

福源宫不到五十年，以本朝人记本朝事，应该比较可信。此外，《东文选》及《东国李相国集》中还保存了三篇高丽文人所作福源宫斋醮文。<sup>①</sup>这些斋醮文是为福源宫举行的斋醮活动而作，绝对不可能把福源宫的名称写错。因此，睿宗时期建造的这座道观的名称应该是福源宫。

关于福源宫的建造时间，最重要的史料有以下四条：

《高丽图经》：“福源观在王府之北太和门内，建于政和间。”<sup>②</sup>“大观庚寅，天子眷彼遐方愿闻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从行。遴择通达教法者，以训导之。王侯笃于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观，以奉高真道士十余人。”<sup>③</sup>

《逸斋记》：（李仲若）“航海入宋，从法师黄大忠、周与龄，亲传道要，玄关秘钥罔不洞释。及还本国，上疏置玄馆，以为国家斋醮之福地，今福源宫是也。”<sup>④</sup>

《宋史·高丽传》：“王城有佛寺七十区而无道观。大观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馀辈。”<sup>⑤</sup>

以上四条材料均未记载建造福源宫的准确时间。《宋史》认为建于大观年间，《高丽图经》认为建于政和年间。究竟哪个说法比较可信，很难判定。

《宋史·高丽传》说福源宫是宋徽宗于大观年间遣道士往高丽所建，《高丽图经》则明确记载遣道士赴高丽的时间是大观庚寅。大观庚寅即大观四年，高丽睿宗五年（1110）。那么，按照《宋史》之说，福源宫当建于睿宗五年。据《高丽史》记载，睿宗五年出使高丽的宋朝官员是王襄和张邦昌。<sup>⑥</sup>这是睿宗即位以来，宋朝第一次正式向高丽派遣外交使团。<sup>⑦</sup>宋徽宗借遣使之机派道士到高丽传播道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睿宗即位后第一次遣使就要为高丽建造道观，似乎有悖常理。而且，王襄等人六月辛巳已到达高丽，七月戊戌回国，在高丽仅停留了十八天，要建造福源宫时间也不够。《高丽图经》的记载来自徐兢在高丽的直接见闻，与《宋史·高丽传》相比，其可靠性显然更高。按照徐兢的说法，大观四年宋朝虽然向高丽派遣了两名道士，但是高丽睿宗直到“政和中始立福源观”。也就是说，即使这两名道士留在高丽继续传教，也不是像《宋史》所说，“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馀辈”，即先建造道观，后培养道士；而是先培养道士，后建造道观，即“遴择通达教法者，以训导之。……政和中，始立福源观”。徐兢出使高丽的时间离大观四年仅十三年，他说福源宫建于政和年间，应该是可信的，但具体是政和几年则不得而知。

据《逸斋记》所述，福源宫是李仲若到宋朝学习道教回国后建造的，因此，李仲若入宋及回国时间就成为考定福源宫建造时间的关键。韩国学者金得槐认为：“高丽朝廷派李仲若赴宋，学习道教要理。李仲若入宋查看道教发展的形势，从道士黄大忠学习道教教理和仪式，后回国将

① [李朝] 徐居正：《东文选》第六册卷一百一十五，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163、170页；[高丽]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三十九，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421页。

② （宋）徐兢：《高丽图经》卷十七《祠宇》福源观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84页。

③ （宋）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93页。

④ [高丽] 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6页。

⑤ （元）脱脱：《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54页。

⑥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三《睿宗世家二》睿宗五年六月辛巳，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92页。

⑦ 《高丽史》卷十三睿宗四年十二月己卯条记载：“宋教练使明州都知兵马使任郭等来。”但这并非宋朝派出的正式外交使团，所以《高丽史》仅仅一笔带过。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91页。

道教传入高丽。睿宗五年,宋徽宗派道士二人来高丽,睿宗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福源宫。”<sup>①</sup>按照金得槐的说法,李仲若入宋及回国时间当在睿宗五年之前。但是李仲若在睿宗五年之前入宋之说,并无直接证据。

据《逸斋记》记载,道流人物李仲若因擅长医术,受召为肃宗治病,还未到达肃宗便已驾崩。“睿祖以在藩邸时素闻其名,遂属籍禁闱,将用禄秩以縻之。先生于是迹出心隐,徘徊宫掖间……为时广成子,欲以至道之精播于理术,日凿生灵之耳目。……后航海入宋”。<sup>②</sup>可见,李仲若是睿宗元年入宫。虽然当时丽、宋两国民间商业往来较频繁,但是作为享有“禄秩”的宫廷官员,李仲若随商船入宋的可能性不大。睿宗元年至五年,高丽向宋朝遣使的记载共有两次:(三年)“二月丙戌,告奏使王维如宋”;<sup>③</sup>(三年七月)“乙亥遣刑部尚书金商祐、礼部侍郎韩曦如等如宋献方物”。<sup>④</sup>王维如宋的情况,《高丽史》中再无记载,中国方面的史籍也无记载。据此推测,王维有可能未能成行,真正成行的只有金商祐使团。金商祐出使在宋徽宗遣道士赴高丽之前,此时高丽朝廷并不了解宋徽宗有向高丽传播道教的意图,因此,睿宗不可能为迎合宋徽宗,派遣李仲若赴宋学习道教。<sup>⑤</sup>

据《高丽史》记载,睿宗十五年六月,睿宗曾“亲醮于福源宫”,<sup>⑥</sup>可见福源宫最迟在睿宗十五年之前既已建成。因此,李仲若自宋回国建造福源宫应该在睿宗六年至十四年之间。睿宗六年至十四年,高丽曾多次向宋朝派遣外交使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睿宗十年派遣的王字之、文公美使团。该使团出发前,“处士郭輿请于所居阙西别业饯入宋使副,王特赐酒果,命内官主办,供帐甚隆,物议非之”。<sup>⑦</sup>郭輿是最受睿宗宠信的道流人物,有“金门羽客”之称。但他毕竟是没有官职的方外之人,由他出面饯别朝廷派遣的外交使团不合名分。郭輿不惜违逆“物议”,举办这场饯别宴会,其中必有原委。据《破闲集》记载,郭輿与李仲若“少以文章相友”,李仲若入仕后两人仍然过存甚密。<sup>⑧</sup>郭輿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饯别赴宋使团,并能得到睿宗的支持,应该是因为使团中有肩负赴宋学习道教任务的李仲若。此外,据宋朝所颁《奖谕设斋

- ① [韩]金得槐:《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45页。此外,日本学者窪德忠也认为福源宫建于大观四年,参阅[日]窪德忠《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
- ② [高丽]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6页。
- ③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世家一》睿宗三年二月丙戌,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83页。
- ④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世家一》睿宗三年七月乙亥,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85页。
- ⑤ 韩国学者梁银容认为李仲若随金商祐使团入宋学习道教,宋徽宗接受其“进言”,向高丽派遣道士。但是梁教授又认为福源宫建于睿宗十二年前后。据《逸斋记》,福源宫是李仲若回国后所建。如果李仲若是随金商祐入宋,那么从睿宗四年回国到睿宗十二年前后上疏建福源宫,时间间隔未免太长。另据金商祐带回的《太后祝寿回诏》所云“卿远因徒介,恭叩佛乘”可知,此次外交活动或许有佛教因素,却不一定有学习道教的诉求。参阅《高丽史》卷十三睿宗四年六月戊寅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89页;梁银容:《福源宫建立·历史的意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文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91页。梁银容教授的论文,承蒙庆尚大学校安东濬教授惠寄,谨致谢忱。
- ⑥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睿宗十五年六月丁亥,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14页。
- ⑦ [李朝]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八睿宗十年六月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第207页;亦见徐居正《东国通鉴》第二册卷二十睿宗十年六月条,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2年,第39页;《高丽史》卷九十七《郭輿传》,第128页。
- ⑧ [高丽]李仁老:《破闲集》卷中,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27页。

诏》所说,王字之等曾在扬州天宁万寿观为徽宗“设斋祝寿”。<sup>①</sup>在道观“设斋祝寿”,是丽、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能在道观设斋,说明高丽使团中必有精通道教之人,此人很可能就是李仲若。又,宋徽宗未应高丽之请,便向高丽颁赐了《大晟乐》。<sup>②</sup>这些史实均暗示,此次出使当有学习道教的目的。因此,李仲若随王字之使团入宋是完全有可能的。中韩史书均未记录李仲若参与此次出使,其实也很正常。古代东亚外交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朝贡外交。在朝贡外交中,宗教交流并非正务。因此,不记录跟宗教有关的事务是很正常的。比如,宋徽宗在大观四年派出的王襄使团中“以羽流二人从行”,中韩两国正史均未明确记录。如果不是《高丽图经》偶尔提及,我们对此也无从得知。因此,不能因为史书中没有关于李仲若从行的记录,就轻易否定李仲若借此次出使之机赴宋学习道教的可能性。王字之使团赴宋后于第二年回国。据此,李仲若回国后上疏建造福源宫应该是睿宗十一年,即政和六年(1116)。<sup>③</sup>

据韩国学者安东濬考证,福源宫跟道教神霄派关系密切。<sup>④</sup>神霄派的兴起,始自政和五年。<sup>⑤</sup>王字之使团赴宋正值林灵素得宠、神霄派盛行之时。李仲若在宋期间学习神霄派道法,是很正常的事情。据《历代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政和七年高丽国进献青牛,宋徽宗把青牛赐予林灵素。<sup>⑥</sup>众所周知,青牛是和道教有密切联系的动物。高丽国进献青牛可能和建造福源宫有关,宋徽宗把青牛赐给林灵素,应该是为了表彰神霄派向高丽传授道法。至于向李仲若传授道要的法师黄大忠、周与龄,很可能就是神霄派道士。<sup>⑦</sup>福源宫与神霄派的关系,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福源宫应该创建于政和六年。

## 二、福源宫与宋朝太一宫的关系

福源宫是仿照宋朝道观建造的中国式道观,<sup>⑧</sup>但是,仿照的是哪座道观,则不得而知。李朝

①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睿宗十一年六月乙丑,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06页。

② 《宋史》载:“中书省言:‘赐高丽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但是,高丽的上表中并未提“请乐”之事。可见,赐《大晟乐》并非应高丽之请。《大晟乐》虽称雅乐,但实际上是道士魏汉律为迎合宋徽宗,以徽宗中指之节所定之乐。因此,徽宗赐乐于高丽,或许跟高丽要求学习道教有关。因为《大晟乐》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李朝史臣甚至对它的纯正性有所质疑,如安鼎福就认为:“所谓《大晟乐》,即道士魏汉津妄引身为度之文,以徽宗之中指中节为尺度,傅会而作之,则其乐之非正可知矣。”参阅《宋史·乐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19页;安鼎福:《东史纲目》第二册睿宗十一年六月条,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第330页。

③ 韩国学者梁银容根据睿宗十五年在福源宫设醮的背景推测,福源宫和安和寺同样具有睿宗王妃顺德王后愿堂的性质。顺德王后逝世于睿宗十二年,据此,梁教授认为福源宫当建于睿宗十二年前后。此说与本文的结论颇能相合。本文根据“太一行次”考察福源宫的建造时间,认为福源宫很可能创建于睿宗十一年,建成于睿宗十三年,详见后文。另参梁银容《福源宫建立·历史的意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文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89页。按:顺德王后逝世于睿宗十三年,梁银容教授偶误为睿宗十二年。

④ [韩] 安东濬:《论韩国医学与道教之关系》,《道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98页。

⑥ (元) 赵道一:《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林灵素传》,《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

⑦ 《高丽图经》记载,宣和五年赴高丽使团成员中有法箴道官太虚大夫龔珠殿校籍黄大中。根据其官职可知,黄大中应是道士,他很可能就是向李仲若传授道要的黄大忠。参阅《高丽图经》卷二十四《节仗》,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128页。

⑧ [韩] 金得槐:《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初年学者金瞻追述高丽道教称：“太一，天之贵神，自汉以来，历代奉事，屡获嘉祥。是以前朝置福源宫、昭格殿、净事色，别建太清观……以行醮礼……。盖以太一，仁星所在之地，兵疫不兴，邦国又安故也。”<sup>①</sup>由此可见，福源宫是奉祀太一的圣地。据韩国学者统计，高丽王朝共举行过二十一次太一醮，<sup>②</sup>仅少于醮三界的次数，可见太一是高丽道教最重要的醮祀对象之一。现存文献中关于福源宫斋醮的记载仅有八次，其中可以考察出斋醮仪式的共有六次，六次之中至少有三次与太一有关（详见后文），这就进一步证明福源宫是醮祀太一的重地。据此推测，福源宫有可能是仿照宋朝太一宫所建。

太一宫是宋朝最重要的皇家道观之一，始建于宋太宗时期。“太平兴国初，司天楚芝兰言：‘按太一式有五福、君基、大游、小游、天一、臣基、直符、民基、四神、地一，凡十太一，皆天之尊神。五福所在之处，无兵役，人民丰乐。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元年入室巽宫，在吴分苏州，请就其地预筑宫祀之，以迎福祀。’”宋太宗接受楚芝兰建议，于太平兴国六年在苏州建太一宫。苏州太一宫建成后，楚芝兰又进言称：“都城东南地名苏村，可从筑宫于此，以应苏台之名，则福集帝都。”考虑到“立庙吴中，岁时严奉颇成疏远”，宋太宗再次接受楚芝兰的建议，于太平兴国八年在苏村营建新宫，是为东太一宫。<sup>③</sup>根据太一“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移”的原理，仁宗天圣六年建西太一宫，神宗熙宁六年建中太一宫，徽宗政和八年建北太一宫，以奉祀太一。

对比关于太一宫和福源宫的记载，可以发现福源宫和太一宫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道士人数相似。东太一宫建成后，“选道士十八人主其焚修”，真宗“八年十月诏：太一宫道士以二十人为额，不得擅添”。据《宋史·高丽传》和《高丽图经》记载，福源宫设置的道士人数也是十余人。可见，太一宫和福源宫的人员编制数大体相同。

第二，太一宫设十殿四廊。福源宫的殿宇，除三清殿和天皇堂可考之外，其他不详。据《高丽史·五行志》记载，福源宫北廊曾发生火灾，<sup>④</sup>依此推测，福源宫可能也设有四廊。

第三，灵宝道场是太一宫最重要的斋醮活动。据李奎报《福源宫行天变祈禳灵宝道场兼设醮礼文》，福源宫也很重视灵宝道场。

第四，太一宫有“军士百三十人卫守之”；福源宫也有看守军和卫宿军把守。<sup>⑤</sup>

第五，太一宫是举行祈雨仪式的重地；高丽王朝也在福源宫祈雨。

第六，太一宫最重视十太一中的五福太一。据徐兢记载，福源宫大门“前榜曰敷锡之门，次榜曰福源之观”。<sup>⑥</sup>“敷锡”，语出《尚书·洪范》“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可见福源宫的名称取自《洪范》。“五福”是“洪范九畴”之一，此处所谓“福源”之“福”当指“五福”。虽然《洪范》“五福”与五福太一不同，但是当它被纳入道教后，涵义转化为五福太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此推测，福源宫崇奉的应该也是五福太一。

第七，宋徽宗政和年间修建北太一宫，政和八年建成。据《高丽图经》记载，福源宫“在

① 《太宗实录》卷七太宗四年二月辛卯，《李朝实录》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1年，第291页。

② [韩]金澈雄：《高丽中期道教·盛行·其性格》，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的变容》，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第171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补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第19页。按：以下关于太一宫的说法，未出注者，均依据《宋会要辑稿补编》第19—22页。

④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十三《五行志一》，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88页。

⑤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卷八十三《兵志三》看守军条、卫宿军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668、670页。

⑥ （宋）徐兢：《高丽图经》卷十七《祠宇》福源观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84页。

王府之北太和门内”。根据上文考证,福源宫创建于政和六年。虽然此时北太一宫尚未竣工,但是李仲若入宋之时北太一宫可能正在营建之中。据此,福源宫选址于北方,有可能是效仿北太一宫之举。即使此说不能成立,按照“太一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移”的规律,也能推算出此时建造奉祀太一的道观,当选址于北方。<sup>①</sup>因此,福源宫选址于“王府之北”,应该跟太一“行次”有关。

中韩两国文献对福源宫的记载均极为简略,但是,从有限的材料所透漏出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福源宫和太一宫在人员编制、建筑布局、管理制度、斋醮科仪、崇奉对象、建筑选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孤立地看,每个相似性也许都只是一种偶合,但是当这么多“偶合”集中在一起时,这种“偶合”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根据这些相似性推测,福源宫很可能是仿照太一宫所建。<sup>②</sup>

### 三、福源宫的宗教活动

福源宫建成后,成为高丽王室举行道教活动的重地。据《逸斋记》记载,李仲若在福源宫“撞鸿钟于讲席,广开众妙之门,而问道之士填门成市,如众星之环天津也”,<sup>③</sup>可见传播道教义理是福源宫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传法活动需要道教理论素养较高的人士,但是高丽道士的素养普遍比较低下,甚至在睿宗时期,福源宫道士就因素养低下遭到“言官论列”。<sup>④</sup>除李仲若之外,或许再无人有能力在福源宫传法。因此,举办各类斋醮仪式才是福源宫最主要的宗教活动。福源宫的斋醮活动大多由王室出面主持,据《新增东国輿地胜览》记载:“睿宗、毅宗尝亲醮于是宫。”<sup>⑤</sup>

福源宫举办的斋醮活动,有正史文献可考的共有五次:<sup>⑥</sup>

- ① 从太平兴国六年(981)在苏州建太一宫到政和六年(1116)正好135年,共有三个四十五年,符合太一的“行次”规律,这从另一个侧面为前文关于福源宫建于政和六年的结论提供了证据。宋朝计算“太一行次”是以太平兴国八年(983)在京城建东太一宫为时间起点,从太平兴国八年到到政和八年(1118)北太一宫建成,恰好也是135年,其间建造西太一宫、中太一宫的间隔均为四十五年。据前引楚芝兰之说,太一将于雍熙元年(984)移入巽宫,当提前“筑宫以祀之,以迎福醮”。可见,苏州太一宫提前三年建成,京城东太一宫提前一年建成。此后的太一宫都在太一“移宫”前一年建成。高丽不像宋朝那样,在太一“移宫”前一年建道观,可能跟李仲若回国后急于效法宋朝道教有关。以太平兴国六年为起点,到政和六年共经过三个四十五年,符合“太一行次”规律,这就为他及时建造醮祀太一的福源宫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福源宫是一项大型建筑工程,并非短期可以完成。如果福源宫的选址跟“太一行次”有关的假设能成立,那么,更大的可能性是,位于王府之北的福源宫于政和六年开工,政和八年建成,这就与宋朝建造北太一宫的时间完全可以契合。
- ② 福源宫并不是完全依照太一宫原样复制,比如福源天皇堂就是宋朝太一宫中没有的殿宇。另据前文所述,福源宫跟神霄派有密切联系,但是太一宫并非神霄派道观。由此可见,福源宫虽然仿照太一宫建造,但也融入了宋朝其他道观及道派的元素。对此问题的认识,承蒙李丰楙教授提示,谨致谢忱。
- ③ [高丽]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6页。
- ④ (宋)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93页。
- ⑤ [李朝]卢思慎:《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五《开城府下》福源宫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9年,第160页。
- ⑥ 《高丽史》睿宗十六年十二月辛丑条记载,睿宗曾于当天“幸福源宫”,但没有记载是否举行斋醮。因此,本文不把此次“幸福源宫”统计进福源宫的宗教活动。在睿宗“幸福源宫”之前,“太白昼见,经天三十餘日”,如果睿宗此次也举行了斋醮,则有可能是为了祈禳天变。

(睿宗十五年六月)丁亥,亲醮于福源宫。<sup>①</sup>

(睿宗十五年)十二月……甲申,亲醮于福源宫,遂幸安和寺。<sup>②</sup>

(毅宗元年)夏四月……乙卯祷雨于山川及诸神祠,醮三界于内殿,太一于福源宫。<sup>③</sup>

(毅宗二十四年)夏四月……乙巳,以寿星再见,命太子醮于福源宫。<sup>④</sup>

(辛祸)四年五月甲戌,以时令不和,醮太一于福源宫。<sup>⑤</sup>

以上五条材料中,睿宗十五年的两次斋醮记录极为简单,没有透漏任何有关斋醮活动的具体内容。据《高丽史》记载,睿宗十五年五月至八月大旱,其间曾举行过多次祈雨仪式,因此,六月丁亥在福源宫举行的斋醮活动很可能也是为了祈雨。睿宗十五年十二月甲申的斋醮,是在睿宗之妻顺德王后丧毕之后举行的,斋醮仪式结束后睿宗便往安和寺,安和寺是顺德王后真堂所在地。据此推测,这次斋醮很可能是为顺德王后祈祷冥福。

除了正史中记载的五次斋醮活动之外,韩国古代文集中还保存了三篇高丽文人所作福源宫斋醮文,分别是李奎报(1168—1241)的《福源宫行天变祈禳灵宝道场兼设醮礼文》、郑誦(1309—1345)的《福源宫行诞日醮礼文》、卞季良(1369—1430)的《福源宫太一移排别醮礼青词》。福源宫是皇家道观,能为福源宫撰写醮文的最起码也应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据《东国李相国集》,《福源宫行天变祈禳灵宝道场兼设醮礼文》作于李奎报任职翰林院期间;<sup>⑥</sup>又据李奎报之子李涵所作《年谱》,李奎报任职翰林是熙宗三年(1207)至康宗二年(1213)。<sup>⑦</sup>《高丽史·天文志》记载,熙宗五年“二月癸未,荧惑犯太微”,<sup>⑧</sup>《福源宫行天变祈禳灵宝道场兼设醮礼文》中则有“火度犯大微上将”之句。<sup>⑨</sup>以此揆之,此文当作于熙宗五年(1209)。郑誦于忠肃王十三年(1326)进士及第,历仕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三朝,于忠穆王元年(1345)去世,因此,郑誦的醮文应该作于忠肃王十三年至忠穆王元年之间。根据原文,此次斋醮的目的可能是为某位王室成员的弥月之喜祈福,但是具体情况难以确考。卞季良于禡王十一年(1385)登文科,朝鲜太祖元年(1392)福源宫被废弃,因此,卞季良的青词只能作于禡王十一年至朝鲜太祖元年之间。根据原文,举办这次斋醮活动的起因可能是太一殿新址落成,但是具体情况同样难以考定。

综上所述,列福源宫斋醮活动简表如下:

- 
- ①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睿宗十五年六月丁亥,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14页。
  - ②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睿宗十五年十二月甲申,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15页。
  - ③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七《毅宗世家一》毅宗元年四月乙卯,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68页。
  - ④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七《毅宗世家三》毅宗二十四年四月乙巳,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86页。
  - ⑤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六十三《礼志五·吉礼·小祀》杂祀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354页。
  - ⑥ [高丽]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三十九,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413页。
  - ⑦ [高丽] 李涵:《李奎报年谱》,见《东国李相国集》,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6页。
  - ⑧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二》,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316页。
  - ⑨ [高丽]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三十九,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421页。

时间	大体情况	目的	醮仪	文献出处
睿宗 15 年 6 月 (1120)	丁亥, 亲醮于福源宫。	祷雨 (?)	不详	《高丽史》卷 14; 《高丽史节要》卷 8
睿宗 15 年 12 月 (1120)	甲申, 亲醮于福源宫, 遂幸安和寺。	荐冥祐 (?)	不详	《高丽史》卷 14
毅宗元年 4 月 (1147)	乙卯, 祷雨于山川及诸神祠, 醮三界于内殿, 太一于福源宫。	祷雨	太一醮	《高丽史》卷 17
毅宗 24 年 4 月 (1170)	乙巳, 以寿星再见, 命太子醮于福源宫。	祈寿	老人星醮	《高丽史》卷 19; 《高丽史节要》卷 11
辛禡 4 年 5 月 (1378)	五月甲戌, 以时令不和, 醮太一于福源宫。	祈时	太一醮	《高丽史》卷 63
熙宗 5 年 2 月 (1209)	李奎报撰《福源宫行天变祈禳灵宝道场兼设醮礼文》。	天变祈禳	灵宝道场	《东国李相国集》卷 39
忠肃王 13 年至忠穆王元年 (1326—1345)	郑誦撰《福源宫行诞日醮礼文》, 具体情况不详。	祈福	诞日醮	《东文选》卷 115; 《雪谷集》卷下
辛禡 11 年至朝鲜太祖元年 (1385—1392)	卞季良撰《福源宫太一移排别醮礼青词》, 具体情况不详。	祈福	太一移排别醮	《东文选》卷 115; 《春亭先生文集》卷 10

据林椿所说, 福源宫是“国家斋醮之福地”。<sup>①</sup> 但是, 韩国文献中记载的福源宫斋醮活动却只有八次。据韩国学者统计, 高丽时期举行的斋醮活动共有 191 次。<sup>②</sup> 作为国家斋醮重地, 福源宫只举行了八次斋醮活动, 与其地位极不相称。对此, 如果用文献漏记来解释, 恐怕缺乏说服力。文献中记载的福源宫斋醮活动次数如此之少, 跟福源宫作为皇家道观的性质有关。

#### 四、福源宫的性质及影响

福源宫是仿照宋朝道观制度建造的皇家道观。由于宋朝皇室崇尚道教, “道教斋醮仪式已成为国家祭祀大典的组成部分”。<sup>③</sup> 与宋朝相似, 福源宫的斋醮仪式也同样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 比如《高丽史·礼志》把福源宫的斋醮活动列入吉礼小祀之中,<sup>④</sup> 便是最直接的证据。另外, 福源宫的名称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如前文所述, 福源宫名称取自《尚书·洪范》。众所周知, 《洪范》传说为箕子所作。韩国古代向以箕子旧邦自居, 高丽王朝于肃宗七年

① [高丽] 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6页。

② [韩] 金澈雄:《高丽中期道教·盛行·其性格》,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的变容》,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第171页。

③ 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74页。

④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六十三《礼志五·吉礼·小祀》杂祀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354页。



(1102) 便已开始祭祀箕子。<sup>①</sup> 睿宗据《洪范》为福源宫取名,表现出强调本国文化特性的倾向。另据金瞻于朝鲜太宗四年上书:“今考太清观行醮之规,年终岁首,只行二度……愿自今依宋制,每岁四立日行祭,命代言或侍臣摄事,有祭文。”<sup>②</sup> 由此可知,太清宫的斋醮仪式仿效宋制,从属于国家祭祀大典。太清宫如此,比太清宫地位更高的福源宫自然也不例外。国家祭祀大典的祭祀活动属于常祀,而常祀性质的祭祀活动,史书通常不会作专门记录,这恐怕正是关于福源宫斋醮活动的记录特别少的根本原因。据《高丽史》记载,福源宫设有杂职将校、散职将相等卫宿军,<sup>③</sup> 但是佛教寺庙除了供奉高丽先王先后的真殿外,没有一座设置卫宿军;福源天皇堂设有看守军散职将相二人,<sup>④</sup> 同样设置看守军的宗教机构,除福源天皇堂和九曜堂两所道教机构外,只有太庙、圜丘、社稷坛、祭器都监等属于国家祭祀系统的宗教机构。由此可见,不仅福源宫的斋醮活动是国家祭祀大典的组成部分,就连福源宫本身也是国家祭祀系统中的一个宗教机构。

高丽道教上继高句丽及新罗时期的道教潮流,太祖七年既在松京创建九曜堂。<sup>⑤</sup> 然而,太祖至睿宗时期的道教行事常“杂于佛教的思想,不可谓之纯全道教”。<sup>⑥</sup> 睿宗从宋朝引进道教,创建福源宫,“置羽流十馀辈,其斋醮科仪,一如宋朝”。<sup>⑦</sup> 至此,高丽王朝的道教科仪才实现体系化,正式形成了以道观为依托的纯正的科仪道教。福源宫的建立赋予道教不同于前代的崇高地位,显示出高丽王朝“三教鼎立”的治世观,<sup>⑧</sup> 从而对高丽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韩国学者金澈雄统计,高丽王朝举行的191次斋醮活动中,148次是睿宗之后举行的,由此可见睿宗之后高丽道教之盛况。现存高丽文人撰写的斋醮青词共计47篇,<sup>⑨</sup> 均作于福源宫建成之后,由此亦可见从宋朝引进规范的科仪道教对提升高丽文人的道教素养起到的重要作用。福源宫的建造,对高丽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仁宗朝以后,以“海左七贤”为代表的山林隐逸之风,可以说就是受道教思潮影响的产物。仁宗九年(1131)颁布“禁诸生治老庄之学”的诏令,<sup>⑩</sup> 证明这个时期治老庄之学在知识阶层已蔚然成风。老庄之学的盛行,无疑与福源宫建造以后高丽社会兴起的道教思潮密切相关。据《逸斋记》记载,李仲若在福源宫

①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六十三《礼志五·吉礼·小祀》杂祀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353页。

② 《太宗实录》卷七太宗四年二月辛卯,《李朝实录》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1年,第291页。

③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八十三《兵志三》卫宿军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670页。梁银容教授认为杂职将校负责宿卫宫门,散职将校负责宿卫大门。未知何据。参阅梁银容:《福源宫建立·历史的意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文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89页。

④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八十三《兵志三》看守军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668页。

⑤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世家一》太祖七年,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⑥ [韩] 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77年,第389页。

⑦ [李朝]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三十九《道教仙书道经辩证说》, <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⑧ [韩] 梁银容:《福源宫建立·历史的意义》,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文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96页。

⑨ [韩] 金澈雄:《高丽中期道教·盛行·其性格》,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韩国的变容》,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第182—183页。

⑩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六《仁宗二世家一》仁宗九年三月甲子,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240页。

传道时,“问道之士填门成市”,<sup>①</sup>可见当时信道之士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福源宫建成之后,随着斋醮活动的频繁举行,道教信仰也逐渐开始波及下层社会。据《高丽史》记载:“国俗以道家说,每至是日(庚申日)必会饮,彻夜不寐,谓之守庚申。”<sup>②</sup>高丽后期庚申信仰的流行,说明道教已影响及民间社会。另据李奎报《老巫篇》所载,巫师作法时,“丹青满壁画神像,七元九曜以标额”,<sup>③</sup>说明道教信仰还渗透进了民间巫俗活动之中。

宋人徐兢记载:“或闻俟享国日,常有意授道家之策,期以易胡教。其志未遂,若有所待然。”<sup>④</sup>依徐兢之说,睿宗王伋有接受道策,以道教替代佛教为国教的意图。考诸《高丽史》等典籍,徐兢之说显然有夸大其辞之嫌。此说或为传闻,或者正如车柱环教授推测的那样,只是徐兢对宋徽宗的阿谀之词。<sup>⑤</sup>其实,“睿宗对佛教的态度并未施加任何压迫或疏远政策,就如同过去历代君主的态度,保存佛教在国教上的地位”。<sup>⑥</sup>作为一座皇家道观,福源宫的地位并不能与皇家佛寺相比肩。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也可看出,福源宫的地位在睿宗之后便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据《高丽史》记载,高宗八年五月,福源宫曾发生火灾,<sup>⑦</sup>却未见关于重修福源宫的记载。就算是漏记,也说明修复规模不会太大。另据《高丽史·百官志》,“高宗时诸事未具,久废亲醮”,<sup>⑧</sup>亦可见此时福源宫的寥落。高丽后期,恭愍王甚至为了改营王轮寺影殿,“幸福源宫相之”,<sup>⑨</sup>后因选址于马岩,福源宫才避免了因扩建佛宇被拆毁的厄运。由此可见,福源宫在高丽虽然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但是终究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

(责任编辑:于光)

① [高丽] 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6页。

②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六《元宗世家二》元宗六年四月庚申,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394页。

③ [高丽]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23页。

④ (宋) 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93页。

⑤ [韩] 车柱环:《韩国道教思想》, [韩] 赵殷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⑥ [韩] 车柱环:《韩国道教思想》, [韩] 赵殷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⑦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十三《五行志一》,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88页。

⑧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七《百官志二》诸司都监各色条,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574页。

⑨ [李朝] 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一《恭愍王世家四》恭愍王十七年五月壬辰,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627页。